

盲流非盲流： 日治時期臺灣盲人的流動與遷移*

邱大昕**

摘 要

盲人通常被視為經濟弱勢且行動上較多障礙，因而活動能力與範圍較為有限。然而自十九世紀末開始，臺灣的盲人因為西洋傳教士的派遣而往來於中國與臺灣之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由於基督教積極鼓勵接受新式教育，因此開始有臺灣盲人到日本唸書、中國盲人到臺灣唸書。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內地許多明眼人加入鍼灸按摩工作，導致當地盲人失去養活自己的能力。由於當時殖民地臺灣只有盲人可以到學校學習鍼灸與按摩，一般人不易取得執照許可，而傳統抓龍又遭到禁止和取締，因此吸引許多日本人前來臺灣工作，也鼓勵臺灣盲人加入按摩這個在臺灣新興的行業。這些跨國或島內移動，與傳統社會盲人的移動方式和目的有明顯的不同。

關鍵詞：盲人、流動、按摩、鍼灸、基督教

* 謝誌：本文初稿曾以〈盲流非盲流：日治時期臺灣盲校為核心的流動與遷移〉為題，於 2014 年 10 月 2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的「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非常感謝陳姪媛副研究員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許宏彬助理教授的鼓勵並提供重要資料，使這篇文章得以順利完成。也特別感謝與談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蔡友月副研究員及其他與會人員，以及本刊匿名審查人和編輯委員所提出的寶貴問題和修改建議，俾使本文更為慎密周延。最後也要感謝黃子柔、薛玉欣、邱媽寅協助資料收集、翻譯及校對，使本文更為充實完善。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4 年 10 月 24 日；通過刊登：2015 年 2 月 25 日。

- 一、前言
 - 二、臺灣盲人到日本
 - 三、日本人到臺灣
 - 四、臺灣與中國間的盲人流動
 - 五、臺灣內部的盲人流動
 - 六、結論
-

一、前言

盲人通常被認為處於經濟邊緣，在行動上具較多障礙，因而活動能力與範圍也較有限。然而從十九世紀末起，臺灣的盲人開始出現許多長距離的移動，無論是在臺灣島內，還是到臺灣以外的地區。雖然和當時盲人整體人數相較，這種移動的人口占少數，但它卻是一種新型態與目的的移動，對日後臺灣盲人的生活樣貌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清末西洋傳教士開始來臺宣教，由於基督教會原就具備運用盲人傳播福音的傳統，¹ 因此治療眼疾和盲人教育經常是傳教士的重要工作。² 1871年12月10日，英國長老會牧師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³ 來到臺灣，由打狗登陸，再搭船到安平港，而後駐點於臺南府城。1873年3月，他從安平港搭乘挪威帆船達芬號（Barque Daphne），由臺灣南端沿東海岸北上到淡水訪問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然後從淡水往南步行，經新港、內社、埔社、水社湖（日月潭），再經白水溪回到臺灣府城。途中，他第一次聽到溫旺（Un Ong）被匪徒挖去雙眼的事件。在當時這類衝突中挖人眼珠頗為常見，《淡

¹ 如約翰福音第九章提到，耶穌治癒盲人讓他們能到處宣講耶穌的醫治和大能。

² 李尚仁，〈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4（2004年6月），頁1-16；李尚仁，〈展示、說服與謠言：十九世紀傳教醫療在中國〉，《醫療、科技與社會》8（2009年6月），頁9-74。

³ 甘為霖（1841-1921），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1871年來臺傳教，1917年退休返回英國。

新檔案》也有許多類似案例的記載。⁴ 溫旺被挖去雙眼讓甘為霖印象深刻，促使他開始準備臺灣盲人的教育工作。

現多認為 1891 年 9 月 12 日甘為霖在臺南市設立的「訓瞽堂」(Hùn-kó-tông) 是臺灣特殊教育的開端，不過其中有諸多誤解。⁵ 首先，「訓瞽堂」一詞最早出現在 1897 年 8 月《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149 卷頁 59 的〈Chhiⁿ-mî-òh (青盲學)〉一文，當時該校已於同年 3 月關閉。在此之前教會報提到這所盲校時，都是以開頭字母大寫的 Chhiⁿ-mî-òh、Chheⁿ-mê-òh⁶ 或 Chhiⁿ-mî-òh-tîng (青盲學堂) 來表示，而非 Hùn-kó-tông。若泛指中國或日本盲人學校時，教會報則以開頭字母小寫的 chhiⁿ-mî-òh 或 chheⁿ-mê-òh 稱之。⁷ 「訓瞽堂」的「訓」常見於日本盲啞學校的校名，如「東京樂善會訓盲院」、「橫濱訓盲院」等；而「瞽」則經常出現在中國盲啞學校的校名，如「啟明瞽目院」、「振聵瞽目學校」。因此，所謂的「訓瞽堂」，應該是後人將日本的「訓」與中國的「瞽」結合而成。此外，在「青盲學」成立之前，許多盲人便因為到教會醫院求治而開始學習點字。例如孫福成(Sng Hok-Seng) 曾因眼疾到臺南府尋求安彼得醫生(Peter Anderson)⁸ 治療無效，從醫院得知甘為霖有給盲人看的書後，在余饒理(George Ede)⁹ 夫人(Mrs. G Ede) 的指導下學習點字。¹⁰ 後來成為青盲學首位盲人教師的林紅(Lim Âng)，¹¹ 也

⁴ 如同治 13 年(1874) 姜阿進被搶匪「目睛擊出」，參見〈姜阿進□□□目睛久候難度無奈哀乞限差跟拘訊嚴律辦事〉，《淡新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編號：33311.12。又如光緒 9 年(1883) 潘春長遭棍番與漢棍毆打，「頭腳遍身受傷，並將兩目挖去」，參見〈大甲西勢社番潘月為通謀毆殺傷重命危懇迅飭差驗明拘兇究辦〉，《淡新檔案》，編號：17206.1。

⁵ 邱大昕，〈誰是盲人：臺灣現代盲人的鑑定、分類與構生〉，《科技、醫療與社會》16 (2013 年 4 月)，頁 11-47。

⁶ Chhiⁿ-mî 屬廈門、泉州腔，Chheⁿ-mê 屬漳州腔，一般寫作「青暝」或「青盲」。青暝現有「認識有誤或認識不清」之意；青盲則為古詞，原為眼疾的病證名。參見劉建仁，〈青暝 (ts'ê-me' / ts'î-mi')：眼瞎、瞎眼、瞎子〉，《台灣話的語源與理據》，下載日期：2014 年 10 月 22 日，網址：<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

⁷ 唯一例外是〈Sân Kàu-hōe (巡教會)〉，《TÂI-LÂM-HŪ-SIÁⁿ KÀU-HŌE-PÒ (臺南府城教會報)》148 (1897 年 7 月)，頁 50。該文提到府城青盲學時以小寫稱呼，但此時該校已經關閉。

⁸ 安彼得 1847 年生於英國，1879 年 1 月 14 日抵臺服務於臺南府舊樓醫館。1901 年底起掌管「打狗醫館」(即慕德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1910 年秋天退休返回英國，1913 年 3 月 12 日在故鄉 Parthshire 去世。

⁹ 余饒理(1854-1905) 為「臺南長老教中學」(即今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首任校長，該校與後來成立的青盲學都位於「二老口街」(今衛民街北門路口) 附近。余夫人(余安妮) 於 1883 年 12 月 23 日與夫婿一同來臺。

¹⁰ George Ede, "Story of the Blind Hospital-Porter in Taiwanfoo," *The Presbyterian Messenger* (Dec. 1, 1887), pp. 6-7.

是因眼疾於 1889 年到臺南的舊樓醫館求治未果，而由教會的赤馬兄（Chhiah-bé-hiaⁿ）¹² 教他點字。

1895 年 4 月 17 日，臺灣、澎湖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同年 10 月 21 日日軍進占臺灣府（臺南）。隔年（1896）甘為霖利用返國度假、回臺前，到東京拜訪時任文部省大臣的樺山資紀男爵，希望日本能夠協助拓展臺灣盲人的教育工作。¹³ 樺山於是寫信讓甘為霖帶給當時負責臺灣事務的兒玉源太郎。這個引介關係，對後來臺灣盲人教育的發展，以及臺日雙方盲人的交流都有重要影響。1900 年「臺南慈惠院」¹⁴ 成立「盲人教育部」後不久，便開始教授日本按摩術。¹⁵ 然而按摩在臺灣原屬較低階的工作，¹⁶ 一般人並不特別喜歡從事，也從來不是臺灣盲人的選項；在傳統社會中，他們多以農業勞動、算命、走唱、乞食等維生。¹⁷ 但是經過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後，按摩卻成為往後臺灣盲人的主要職業，其中轉變過程究竟為何，迄今仍不清楚。本文透過臺灣南部基督教會保留的史料，以及日治時期官方的文獻檔案、統計調查資料等，探討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盲人的流動及其原因。由於臺灣缺乏盲人本身所留下的文字紀錄，因此本文也輔以若干訪談資料作為補充。

¹¹ 林紅，字朝魁，寶斗仔（Pó-táu-á，即今彰化縣北斗鎮）人，1889 年到臺南的舊樓醫館找 Peter Anderson 醫生求治未癒，乃在赤馬兄（Chhiah-bé-hiaⁿ）指導下學習點字，1891 年 6 月受洗，1900 年 10 月 9 日在新港過世。參見 William Campbell, 514.4 (March 10, 1897), p. 645; 518.7 (April 28, 1897), p. 649; 519 (May 5, 1897), p. 649, in William 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Hastings: F. J. Parsons, 1910); "The Gospel in China," *The Monthly Messenger* (Sept. 1, 1891), p. 10; "A Blind Teacher," *The Monthly Messenger* (May 1, 1892), p. 7。

¹² 赤馬兄即林學恭牧師，參見〈Siau-sit (消息)〉，《TÂI-OÂN-HŪ-SIÂN KÀU-HŌE-PÒ (臺灣府城教會報)》74 (1891 年，清光緒 17 年 2 月，月份日期以清曆計算)，頁 41。

¹³ William Campbell, "A Visit to Japan," *The Monthly Messenger* (March 1901), pp. 77-78.

¹⁴ 臺南慈惠院係當時臺南縣廳將改隸前既已存在之養濟院、普濟堂、育嬰堂、棲流所、卹養局、義塚等社會事業加以合併，於 1899 年 10 月創設於臺南市。其救養區域定為臺南、阿維、臺東及花蓮港四個廳之轄區。參見陳燕禎，〈臺灣社會福利發展：日治時代社會福利機構的歷史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9 (2005 年 3 月)，頁 235。

¹⁵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臺南：該校，1930），頁 1。

¹⁶ 根據時任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官片岡巖（1921 年）的《臺灣風俗誌》，娼妓、戲子、巫者、吹鼓手（喪葬樂隊）、牽豬哥、剃頭、婢僕、掠龍（按摩師）、土公仔（抬棺、檢骨者）在臺灣屬於「下九流」的行業。參見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頁 147-149。

¹⁷ 邱大昕，〈被忽略的歷史事實：從視障者工作演變看大法官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 2 (2009 年 12 月)，頁 55-86；邱大昕，〈為什麼馬殺雞？：視障按摩歷史的行動網絡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3 (2011 年 8 月)，頁 5-36；邱大昕，〈臺灣早期視障教育之歷史社會學研究 (1891-1973 年)〉，《教育與社會研究》24 (2012 年 6 月)，頁 1-39；邱大昕，〈臺灣早期身心障礙社會工作初探：以甘為霖的盲人工作為例〉，《當代社會工作學刊》(2015 年，即將出版)。

二、臺灣盲人到日本

十九世紀末日本的盲人學校，課程中都有按摩和針灸。日本盲人從事針灸工作已有很長的歷史，這和日本針術所使用的針具有很大的關係。據說德川幕府時期，盲人針灸師杉山和一（1610-1694）發明「管鍼法」進針方式後，確立盲人與針灸工作的連結。這種針法所使用的針較細、較短，進針也較準確，比較不會造成疼痛，因此適合盲人使用。¹⁸ 日本京都府立盲啞學校於 1880 年 9 月設置「按針術科」，位於東京的樂善會訓盲學校也在 1881 年開始教授按摩和針灸。由於當時明治政府急於輸入西洋醫學，盲人學校的課程內容，除了傳統的經穴原理外，也開始教授西洋的生理學和按摩（massage）等，使盲人從事的按摩更具有現代醫療的基礎和專業地位。¹⁹

日本統治臺灣後，開始有臺灣盲人前往日本求學。最早一批是青盲學畢業的郭主恩、²⁰ 蔡谿、陳春等三人，他們於 1897 年夏天前往「東京盲啞學校」就讀。剛開始由於沒有經費，該校沒有立刻接受他們入學。²¹ 甘為霖為了幫他們籌措學費，便寫信給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學務長伊澤修二。²² 不久，伊澤回日本提及此事，一位盲人樂師便提議舉辦音樂會來募款。當時《臺南府城教會報》的報導如下：

對按呢這過（chit-kòe，這次）的音樂會所趁的錢有五百外箍，攏寄去東京青盲學，欲做甘牧師對臺南差去的青盲囡仔的所費。……佇 6 月 20 日甘牧師所差 3 个青盲囡仔已經落船去日本；就是屬府城入教的陳春（Tân Chhun）、蔡谿（Chhòa Khe）、郭主恩（Koeh Chú-in）。咱有時著數念

¹⁸ 肖永芝，〈日本古代針灸醫學源流概論〉，《中國針灸》1999: 5，頁 311〔按：中國大陸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Akiko Kobayashi, Miwa Uefuji, and Washiro Yasumo, “History and Progress of Japanese Acupuncture,”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7: 3 (Sep. 2010), pp. 359-365.

¹⁹ 中山太郎，〈日本盲人史〉（東京：昭和書房，1934），頁 163。

²⁰ 郭主恩（1881-?），臺南糖商郭意之子，6 歲失明。參見〈島政：染習感化〉，《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6 月 14 日，第 3 版。

²¹ 〈臺灣盲生郭主恩〉，《臺灣協會會報》2: 8（1899 年 5 月 20 日），頁 59-60。

²² 伊澤修二（1851-1917），日本長野縣人，第十任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之兄，曾於 1895-1897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長。

(siàu-liām) in, 求上帝予 in 進步, 別日做主的大路用。²³

郭主恩等三人於6月20日抵達日本, 募款音樂會6月26日舉行, 參加者除了一般老百姓外, 也有宮廷貴族購買了「上等位」100張, 共募得500多圓。²⁴ 不過, 募得款項其實並不全是給這三名學生的補助, 後來東京盲學校對此事有如下的記載:

為了籌募來自臺灣臺南府的盲校學生進入本校的入學學費補助金, 主辦人山勢松韻、²⁵ 幹部小山作之助,²⁶ 於東京音樂學校舉行了募款音樂會。全力贊助的名譽贊助成員以伊澤修二、津田仙²⁷ 兩人為首, 有公爵岩倉具定、²⁸ 子爵山尾庸三、²⁹ 真中忠直、矢島作郎、矢田部良吉、³⁰ 岸田吟香、³¹ 前島密、³² 大內青鸞等人。收入四百八十圓中的三百三十圓指定捐款至東京盲啞學校, 一百五十圓則指定捐款至京都盲啞院。³³

三位盲生利用開學前的時間前往橫濱, 由海岸教會的細川瀏³⁴ 牧師安排住宿, 並由周添佑³⁵ 教他們日語。³⁶ 9月6日三人回到東京芝區明治學院, 13日巴克禮³⁷ (Thomas Barclay, 1849-1935) 陪同他們辦理入學和住宿手續。³⁸ 伊澤修二

²³ 〈Chhiⁿ-mī-òh (青盲學)〉, 《TÂI-LÂM-HŪ-SIĀⁿ KÀU-HŌE-PÒ (臺南府城教會報)》149 (1897年8月), 頁59。

²⁴ 〈Chhiⁿ-mī-òh (青盲學)〉, 頁59。

²⁵ 山勢松韻 (1845-1908), 3歲失明, 山田流古琴家。

²⁶ 小山作之助 (1864-1927), 日本教育家、作曲家, 曾任日本教育音樂協會首任會長。

²⁷ 津田仙 (1837-1908), 日本農業學家、基督徒, 樂善會訓盲院的創立者之一。

²⁸ 岩倉具定 (1852-1910), 日本政治家, 第4代宮內大臣、貴族院議員。

²⁹ 山尾庸三 (1837-1917), 樂善會訓盲院的創立者之一。

³⁰ 矢田部良吉 (1851-1899), 日本植物學家、詩人。

³¹ 岸田吟香 (1833-1905), 日本新聞記者、教育家, 樂善會訓盲院的創立者之一。

³² 前島密 (1835-1919), 日本政治家, 時任北越鐵道株式會社社長。

³³ 東京盲學校編, 《東京盲學校六十年史》(東京: 該校, 1935), 頁219。

³⁴ 細川瀏 (1856-1934), 日本牧師。1895年9月下旬受命赴臺灣任「慰問使」, 臺南城陷日後與巴克禮 (Rev. Thomas Barclay) 歷訪臺灣各地, 同年12月17日離臺。1896-1901年擔任橫濱海岸教會第二任牧師。

³⁵ 周添佑 (Chiu Thiam-iū), 即周福全, 幼名添佑, 為臺灣本地最早期傳道者之一周步霞 (1846-1923) 的次子。1895年由細川瀏帶去日本讀書, 是最早留日的臺人學生之一。

³⁶ 〈Cháp-hāng ê Siau-sit (雜項的消息)〉, 《TÂI-LÂM-HŪ-SIĀⁿ KÀU-HŌE-PÒ (臺南府城教會報)》151 (1897年10月), 頁74。

³⁷ 巴克禮出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 1875年6月5日來到臺灣, 成為英國長老教會第5位來臺牧師。

不僅抽出時間教授三位盲生日語，也教導東京盲啞學校的老師臺語，以便彼此溝通。郭主恩後來對最初的這段學習過程有如下描述：

巴克萊先生一開始帶我去伊澤老師家，介紹伊澤老師給我認識。並叫我對老師說些什麼話，不論是什麼都好。老師家離學校也很近，巴克萊先生就叫我將去老師家的路記起來。……當時〔伊澤〕老師也曾為了我們下午兩點到四點都用英語教我們日語，老師的英文說得很清楚也很好。……去老師家的話，老師就會請我們吃飯，然後一邊教導我們日語一邊拿一個一個的實物給我們看。……我說日本真好時，老師就會對我說「臺灣是個好地方」、「還想再去臺灣」、「死在臺灣也好」等等的話。老師好像十分喜歡臺灣的樣子。〔明治〕三十一年夏天在鎌倉的暑期學校開課時，我受邀去跟大家分享臺語及臺灣的事情。那個時候，老師送了一件羽織〔日本的和服短外套〕給我。摸起來的感覺是一種冰涼滑順的料子，在鎌倉時看到這件羽織的人們都說這件羽織非常的好，那時我才知道老師送了一件非常好的東西給我。³⁹

可能因為日本和臺灣氣候差異太大，陳春和蔡谿經常生病（陳罹患赤痢，蔡則是腳氣病），希望可以回臺休養。因此兩人後來轉入「速成科」，並於 1898 年 7 月 16 日提前回臺，只有郭主恩繼續留下來讀書。後來，他的日文學得很好，凡有來自中國或臺灣的訪客參觀東京盲校時，都是由郭擔任口譯。⁴⁰ 當時盲啞學校經常被用來代表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程度，因而成為外賓的參觀場所。1903 年 2 月 28 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生，從基隆搭近江丸輪船前往日本參加修學旅行。除了參觀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東京帝國大學和醫科大學、京都帝國大學、長崎醫學專門學校、大阪醫學校和病院外。⁴¹ 3 月 19 日參訪東京盲啞學校，使

³⁸ 〈臺灣盲生郭主恩〉，頁 59-60；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編，《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臺北：該會，1944），頁 142。

³⁹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編，《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頁 145。

⁴⁰ 〈臺灣盲生郭主恩〉，頁 59-60；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編，《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頁 143。

⁴¹ 容世明，〈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生 1903 年的日本修學旅行〉，《臺灣醫界》55: 11（2012 年 11 月），頁 43-47。

臺灣醫學生對日本盲啞教育的發達感到印象深刻。同年，張謇（1853-1926）到日本考察工廠並參觀博覽會時，也曾前往盲啞學校參觀，回國後成立第一所中國人自辦的特殊學校「狼山盲啞學校」。⁴² 1905年許炳榛赴日考察，也前往參觀東京盲啞學校，他的考察日記對當時日本盲啞學校的學制章程有詳細的記載。⁴³

郭主恩到日本的第三年（1899），臺灣協會決議從該年5月份開始提供他每月10圓的學費資助。⁴⁴ 隔年（1900）9月，郭完成學業回到臺灣後，希望能在臺北或臺南設立一所盲校，⁴⁵ 因此曾尋求富商李春生⁴⁶ 的贊助。⁴⁷ 不過，同年臺南官方以縣令第25號指定臺南慈惠院附設教育部成立「盲人教育部」，郭主恩因此於同年11月進入臺南慈惠院盲人教育部任教。盲人教育部設置五年制普通科和三年制技藝科，技藝科主要教授日本按摩術；普通科的課程，則包括修身、國語、算術、體操、唱歌等，三年級才開始學習日式按摩。⁴⁸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對臺灣原有寺廟信仰和外國神職人員較為寬容，⁴⁹ 慈惠院盲人教育部首任校長秋山珩三⁵⁰ 是一位基督徒，「該校學生可以自由參加教會禮拜，或於課外時間接受基督教的教訓」。⁵¹ 1905年春天，一位日人Katsumata來臺販售日文和英文聖經，他特地去拜訪盲人教育部的校長，由他唸聖經，讓校長用點字打成點字書。⁵²

雖然甘為霖鼓勵盲人到日本唸書，但他並不贊成臺灣盲人從事按摩這項工作。他認為這是日本盲人的傳統行業，日人早已習慣求助治療按摩，所以日本盲人得以賴此謀生；但是臺灣人對此還很陌生，盲人無法藉此生活。甘為霖尤其不

⁴² 張蘭馨，〈張謇和他創辦的狼山盲啞學校〉，《教育史研究》1（2005年3月），頁35-36。

⁴³ 許炳榛（生卒年未詳），廣東番禺（今廣州）人。光緒34年（1908）時任駐舊金山市總領事。參見許炳榛，《乙巳考察日本礦務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32。

⁴⁴ 〈雜報記事：臺灣盲生〉，《臺灣協會會報》3:12（1899年9月29日），頁85。

⁴⁵ 〈感心な盲人〉，《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6月13日，第5版。

⁴⁶ 李春生（1838-1924），本籍福建廈門，14歲受洗為基督徒。1858年擔任廈門英商怡記洋行地區負責人，1868年到臺北大稻埕從商，並擔任英商寶順洋行總辦。

⁴⁷ 〈島政：企圖盲啞〉，《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6月16日，第3版。

⁴⁸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1930年版），頁1。

⁴⁹ 盧啟明，〈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信徒之身分認同（1937-1941）〉，《臺灣學研究》14（2012年12月），頁147-170。

⁵⁰ 秋山珩三（1876-1908），或稱秋山衍三、秋山衍藏，日本山梨縣中巨摩郡奈湖村人。

⁵¹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2000），頁110。

⁵² Frederick Parrott, "A Japanese Colporteur in Formosa," *The Monthly Messenger* (March 1906), pp. 69-71.

贊成女性盲人從事按摩業，因此他曾向日本官方建議讓受過教育、能說流利日語的盲人到政府部門從事通譯工作，⁵³ 可惜這項建議並未被當局採納。1900 年代日本從內地招募大批土地調查人員來臺投入土地調查工作，當時陳春、蔡谿等人每年收入可達 400 餘圓，⁵⁴ 後來郭主恩也於 1903 年離開盲校自行開業。由於當時臺南只有他們三人懂得西洋按摩，三人平時穿著日人的服裝，又操持熟練的日語，因此收入很高。顧客群主要來自官廳宿舍、料理店和娼寮，每次按摩 20 錢，一天接按 4 人就有 80 錢，每月收入平均至少 20 圓。

臺灣第二批到日本留學的盲人是廖旺⁵⁵ 和陳祿，他們從臺南慈惠院盲人教育部畢業後，於 1909 年 7 月 1 日搭乘臺南丸前往東京。⁵⁶ 該年，日本盲、聾教育開始分離，東京盲啞學校改制分為「東京盲學校」和「東京聾啞學校」。四年後（1913 年），廖旺自東京盲學校畢業，回到臺南慈惠院盲人教育部任教。1915 年第六任臺灣總督安東貞美撥款 2 萬 5,000 圓給臺南慈惠院，並增設啞生部，因而更名為「私立臺南盲啞學校」。雖然當時規定學校課程內容不可與宗教有關，但女傳教士仍能在課餘時間到盲校傳教或帶領學生唱詩歌。⁵⁷ 第一位臺籍的視障女教師郭在，1915 年就讀慈惠院盲人教育部，畢業後也到日本盲校研習。郭在回臺後曾短期任教於臺南盲啞學校，1920 年換任臺北盲啞學校，直到 1951 年去世。⁵⁸ 1922 年私立臺南盲啞學校由臺南州政府接辦，改名「臺南州立盲啞學校」。同年 4 月 28 日，廖旺離開該校，在臺南開設「臺南鍼按院」從事針灸按摩工作，並收盲人為學徒。1927 年 3 月 24 日，臺南州立盲啞學校畢業生莊淇金⁵⁹ 前往東京盲

⁵³ 〈Chhiⁿ-Mí Lâng (青盲人)〉，《TÂI-LÂM HŪ-SIÂN KÀU-HŌE-PÒ (臺南府城教會報)》188 (1900 年 11 月)，頁 87。

⁵⁴ 〈雜報：可風之三盲人(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19 日，第 5 版；〈雜報：可風之三盲人(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20 日，第 5 版；〈雜報：可風之三盲人(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22 日，第 5 版。

⁵⁵ 廖旺出生於 1890 年，5 歲因眼疾失明，9 歲至臺南慈惠院盲人教育部就讀，15 歲在甘為霖帶領下信基督教，1961 年在臺南太平洋境教會創立「臺南基督教盲人會」。參見廖明惠，〈眼失明心光明：盲人教會創辦者廖旺〉，《臺灣教會公報》3002 (2009 年 9 月 7-13 日)，頁 10。

⁵⁶ 〈島內電報：盲生的內地留學〉，《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6 月 30 日，第 2 版。

⁵⁷ William Campbell, "Work for the Blind: Formosa," *The Presbyterian Messenger* (March 1915), pp. 96-97.

⁵⁸ 蔡龍雄，〈九十年來臺北啟明史〉(未刊稿)。

⁵⁹ 或稱莊其全，生於臺南州新豐郡白河庄。參見〈盲人內地留學〉，《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4 月 5 日，第 7 版。

學校就讀，返臺後定居嘉義市，並改名「吉川其全」。⁶⁰

由以上敘述可知基督教在早期臺灣的盲人教育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創立青盲學的甘為霖之外，慈惠院盲人教育部首任校長秋山珩三，以及後來成立「木村盲啞教育所」的木村謹吾等，都是基督徒。由於基督徒積極接受西式教育，⁶¹ 因此才會鼓勵盲生到日本留學，郭主恩、蔡谿、陳春、廖旺等人赴日求學之前都已入教。⁶² 中國福州的盲生黃開華，可能也是教會的關係才來臺念書，因此回國後也在福建的教會學校教書。⁶³ 按摩在臺灣原非盲人從事的行業，早期留日盲生返臺後雖多任教盲啞學校，但最後都選擇自行開業按摩。其中，除了臺、日籍教師薪俸上的差別待遇外，⁶⁴ 也可能與學校改為公立後，和教會關係漸遠有關。另一方面，推拿或按摩在傳統臺灣社會屬下九流行業，但郭主恩、廖旺等寧捨教職、改從按摩業，也可看出按摩業在臺灣社會地位的提升與改變。

三、日本人到臺灣

日治時期有許多日本盲人和非盲人的針灸按摩師來到臺灣教書或工作。雖然從鎌倉時代（1192-1333）開始，按摩就逐漸成為日本盲人的主要工作，但法令並未限定只有盲人才能從事。⁶⁵ 十九世紀中，日本開始有許多明眼人加入按摩行業，導致盲人逐漸失去養活自己的能力。到了二十世紀初，按摩收入較高的區域如東京市內，擁有按摩證照的 3,741 名按摩師中，男性非盲人就占了七成、女性非盲人占一成，剩下的兩成才是盲人。⁶⁶ 1911 年全日本從事按摩工作的盲人有

⁶⁰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臺南：該校，1936），頁 73。

⁶¹ 這和日治時期澎湖許多人因改信基督教後，才赴日求學類似。參見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收於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論文集》（澎湖：該局，2002），頁 396-417。

⁶² 〈Chhiⁿ-mī-òh（青盲學）〉，頁 59。

⁶³ 1929 年度之中華盲人工作中提到有一名盲生到臺灣學「科學」。參見傅步蘭，〈1929 年度之中華盲人工作〉，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1983），第 11 冊（上），頁 106-109。

⁶⁴ 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第六章：從薪俸制度的差別待遇談公學校臺籍教師的隱性抗議〉，收於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校園生活、補習文化、體罰、校園欺凌及抗拒殖民形式》（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27-148。

⁶⁵ 中山太郎，《日本盲人史》，頁 163。

⁶⁶ 〈臺北的鍼と按摩〉，《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3 月 9 日，第 5 版。

5,575 人，只占健康狀態且有收入者的四成；⁶⁷ 且除了都會區外，收入並不高。

日本內務省曾針對全國盲人的生活狀態進行調查。根據各府縣知事提出的報告統計顯示，健康且有收入的盲人共1萬4,097人。其中，從事歌舞樂曲者，男子1,704人、女子2,277人；其他按摩相關業者5,575人。收入所得部分，歌舞樂曲相關業者，男子每人每日平均28錢9厘、女子21錢9厘；收入最高的地區為東京市，男子71錢、女子37錢8厘，收入較低的地區為岩手縣，男子7錢9厘、女子11錢。落語家⁶⁸ 的收入，男子每人每日平均25錢1厘、女子14錢9厘；收入最高的地區為東京市男子47錢9厘、兵庫縣女子30錢。按摩業的收入，分別為東京市男子1圓46錢、北海道女子56錢6厘占最高。全國的盲人並無法像在東京市者一樣，因地緣關係而有相當的收入，由此可感受到其生活困難的狀況。⁶⁹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日本盲人或非盲人針灸按摩師也來到臺灣找尋工作。1902年8月臺北廳公布「鍼灸術按摩營業約束章程」，規定從業者必須具備「地方廳所領與官准單抄本」（官准單）或「師家之習熟證書」，而針灸習業證書還必須有至少2名醫師證明，違者將會被拘留或科以罰金。⁷⁰ 不過，日本人即使資格不符，仍可透過私下管道從工會取得專業能力證明。1905年日本眾議員奧野氏和高木氏提出盲人保護法案，建議「鍼按兩業應該於一定的法規之下，不但限於盲人為對象，且需要證照資格。但是若非盲人者且一直從事該業者得以繼續營業，醫師、護士、看護不在此限」。⁷¹ 考慮到明眼人可能反彈，該建議案的但書中明列，過去從事此業者日後可繼續營業，但今後僅發給盲人證照資格。該案雖於同年2月21日無人異議全數表決通過，不過並不適用於臺灣。1905年臺北持有按摩業許可證照的25人均為日人，其中5位是盲人，恰好與當時東京按摩師盲人的比例相同。收入較高者都是明眼人，如加峯氏、山下氏、森岡氏、石川氏、三木氏、山田氏等，每月平均收入有20日圓以上，⁷² 似乎高過當時東京平均的

⁶⁷ 〈盲人の統計〉，《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5月21日，第4版。

⁶⁸ 落語是日本的娛樂表演型式之一，類似單口相聲，表演內容多半是小人物樂天的短篇故事，落語家則是以此為職業的專業表演者。

⁶⁹ 〈盲人の統計〉，《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5月21日，第4版。

⁷⁰ 《臺北廳廳報》92（1902年11月11日），頁160-161。

⁷¹ 〈臺北の鍼と按摩〉，《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3月9日，第5版。

⁷² 〈臺北の鍼と按摩〉，《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3月9日，第5版。

按摩收入。全臺從事針灸按摩工作人數，也是日人多於臺人。1905年臺人從事按摩者總共僅8人，其中應該包括慈惠院第一屆畢業生4人，及郭主恩、蔡谿、陳春等三位從日本學習歸來的盲人，只有一位不是學校訓練出來者。此時日本來臺從事按摩業者已有61人，針灸也有48人。⁷³不過，當時仍有臺人從事傳統的「掠龍骨」，他們也和日本按摩師一樣吹奏按摩笛聲，因此有些民眾會誤以為是日籍按摩師而光顧，加上他們的收費較低，也能吸引不少顧客。⁷⁴

1905年臺南慈惠院制定盲生教育分為五年制普通科和三年制技藝科，普通科的課程包括修身、國語、算術、體操、唱歌等，第三年才開始學習日式按摩，技藝科則教授日本按摩術。東京盲啞學校畢業的盲生中村氏，1905年到臺南慈惠院任教。⁷⁵1903-1917年，臺南慈惠院盲生教育部和後來的臺南盲啞學校共有31名盲生畢業。⁷⁶根據《臺灣衛生要覽》統計，1917年臺灣人從事按摩工作者共115人，首度超越日本來臺從業按摩的106人，此後在臺從事按摩工作的臺人就一直高於日人；針灸則要等到1933年之後，才超越日本來臺執業人數（見圖一）。由於官方統計並未區分盲人和明眼人，加上1936年之後就沒有盲校畢業生統計數字，因此只能間接推估盲人教育的影響。

1917年6月25日，木村謹吾⁷⁷夫婦在臺北廳大稻埕的木村胃腸醫院設立「木村盲啞教育所」和學生宿舍。當時共收盲普通科學生4名、按摩專修科3名、啞普通科2名；成立時僅有3名職員，分別為所長兼教師的木村謹吾、木材トク及牛島宏。⁷⁸1918年木村盲啞教育所招收的20名盲生中，臺籍有16名、日籍4名；臺籍兒童依照公學校令進行教學，日籍兒童則依據小學校令，⁷⁹並教授中年盲人簡易按摩。1919年3月25日，木村盲啞教育所第一屆按摩專修科有5名學

⁷³ 〈警察取締營業〉，收於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九統計書》（臺北：該課，1905），頁438。

⁷⁴ 〈臺北の鍼と按摩〉，《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3月9日，第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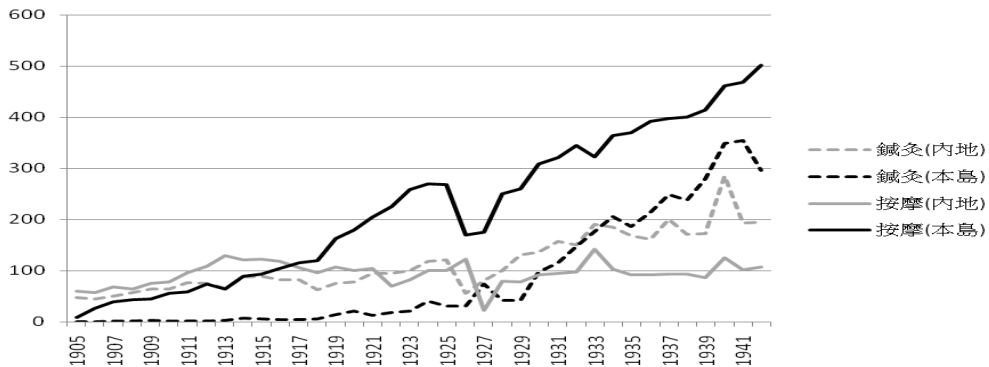
⁷⁵ 〈雜報：臺南慈惠院近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7月1日，第4版。

⁷⁶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1930年版），頁63-65。

⁷⁷ 木村謹吾畢業於日本海軍軍醫學校，是虔誠的基督徒，1895年隨日本軍隊來臺。其父木村廉敬是位盲人，精通鍼治及漢法醫學，曾在家鄉開設鍼療院並傳授學生。1890年在東京創鍼治專門學校，後前往橫濱基督教訓盲院任教。參見木村謹吾，〈臺北訓盲院設立趣意書〉（1915年），收於臺北啟明學校編，《北明叢書38輯》（臺北：該校，2012），頁11-12。

⁷⁸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臺北：該校，1929），頁1。

⁷⁹ 〈盲啞學校計畫：盲啞教育部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3月7日，第7版。



圖一 臺灣按摩與針灸執業人數（含盲人與非盲人）

說明：本圖乃根據 1905-1942 年間《臺灣總督府統計書》中的警察取締營業所製作。1906-1923 年的統計單位為臺灣總督官房文書課、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4-1928 年為臺灣總督官房文書課、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29 年為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30-1942 年則為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總督警務局、臺灣總督官房企畫部、臺灣總督府總務局。調查範圍均為全臺灣（含澎湖），由於統計資料未區分盲人與非盲人，因此這裡的人數包括兩者。

生畢業。隔年 1 月 7 日，木村八重就任教務主任兼舍監；8 月 30 日，木村盲啞教育所獲得日本政府承認設立，核准改為私立臺北盲啞學校，並於 11 月將校舍遷往臺北西門外街 1 丁目九番地。⁸⁰

1922 年臺南州立盲啞學校分設普通科、技藝科與專修科，盲生部之技藝科與專修科設「鍼按」分科。⁸¹ 當時盲生部普通科課程為修身、國語、算數、體操、唱歌，而按摩科兼修生則須修習解剖、生理、病理、衛生大意、鍼按、推拿等，⁸² 學校師資也多來自日本。1923 年全臺從事按摩工作人數達 340 名，其中臺籍者占多數（260 人），不過從事針灸者則以日籍者居多（臺籍 21 人，日籍 90 人）。⁸³ 1930 年臺南盲啞學校負責盲生的 4 位老師中，除鄭克剛外，其餘 3 位來自日本；⁸⁴ 1936 年的 5 名教職員中，除吳元參外，其餘也均來自日本。⁸⁵

⁸⁰ 木村謹吾，〈臺北訓盲院設立趣意書〉（1915 年），頁 11-12。

⁸¹ 劉寧顏總纂，李雄揮、程大學、陳清添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 6 文教志：教育行政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451。

⁸² 〈全島唯一的州立盲啞學校：創設三十三年之歷史を有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1 月 1 日，第 39 版。

⁸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臺灣衛生要覽〉（臺北：該課，1925），頁 155-156。

⁸⁴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1930 年版），頁 60。

⁸⁵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1936 年版），頁 64。

1924年日本殖民政府公布「針術、灸術營業取締規則」，⁸⁶開始統一規定從事針術、灸術者必須修畢鍼術、灸術四年以上，並通過由各知事或廳長舉辦的考試。考試科目包括：一、人體構造、主要器官機能和筋路、神經脈管的關係；二、人體各部位刺鍼法、灸點法、經穴及禁穴；三、消毒法大綱，四、鍼術、灸術實習。無許可證者，禁止在業務上使用電器烙鐵類的器具或藥品施術投藥。臺南盲啞學校盲生部技職部鍼按分科修業年限原為3年，為配合新頒布的按摩術營業規則，乃延長為4年。⁸⁷同年（1924）公布「按摩術營業取締規則」，規定凡已持有各地方廳發放的按摩術、西洋按摩術、柔道整復術⁸⁸營業許可等的業者，均視為合法營業，但新開業或新執業者，則須通過內務省、知事、廳長舉辦的按摩術考試合格，或修習指定學校（臺北州立盲啞學校、臺南州立盲啞學校）、講習所的課程合格畢業，否則禁止在業務上替脫臼或骨折患者施術。⁸⁹按摩術考試分甲、乙兩種，甲種為修畢四年以上按摩術，乙種則為修畢兩年以上者，後者僅限盲人參加。同年府令第20號發布「按摩術營業取締規則」，將按摩術、柔道整復術、接骨術等諸營業許可統一歸併於該規則管理，接骨業者為該令施行前所許可，取締規則公布後新加入者一概不為允許。考試資格規定要修畢若干年的按摩術課程，但似乎可以「教授指導推荐」取代，只是對一般盲人可能頗為困難：

臺北市南北兩署，近來對於無免許的按摩業者，取締非常嚴重。若受告發，聽說罰金、拘留以外，尚且要賞巴掌三個。所以無免許的按摩盲人，多叫苦連天。據一般盲人所說：我們非不要試驗，實因及第比登天還難，且有種種黑幕存在。其最為難者有三：一要知全身骨骼名稱、二要會說日本話，三要教授指導者推荐（但被推荐者要備謝金五十圓至百圓呈贈教授為謝禮）。照前記三項為免許的根據，雖是一項及二項得及第，但事至第三項，非傾家賣產，也難飽教授的慾壑，所以免許實是難上之難。⁹⁰

⁸⁶ 〈鍼術、灸術營業取締規則〉，《臺灣總督府府報》3177（1924年3月5日），頁7-8。

⁸⁷ 〈盲啞校則改正〉，《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0日，第5版。

⁸⁸ 柔道整復術是一種將骨折、脫臼、拉傷、挫傷等的部位恢復正常的技術。

⁸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臺灣衛生要覽》，頁155-156。

⁹⁰ 〈南北署取締按摩 盲人叫苦連天〉，《臺灣民報》230（1928年10月14日），頁6，引自鄭志敏輯錄，《日治時期〈臺灣民報〉醫藥衛生史料輯錄》（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04），頁222。

1928年「私立臺北盲啞學校」改制為「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由於當時臺灣並沒有培育盲人教育師資的學校，因此多數教師均來自日本。1929年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盲生部的教職員有8名，除郭在和高火外，木村謹吾、吉岡豐、⁹¹三好辰治、木村高明、⁹²三好イソ、赤木一樹都是日人；學生中，則有臺人41名，日本內地人5名。⁹³1930年8月2日，全國盲聾啞教育大會在臺灣總督府會議室舉行，由來自日本各盲啞學校的校長和教諭23人，及臺灣本地相關人士23人共同參與。⁹⁴由於當時臺灣和朝鮮之間交通不便，儘管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也有許多盲人學校，但並沒有任何代表來臺開會。會中決議各學校對盲生部畢業生「自稱靈的療法或家傳灸術欺瞞患者之人，嚴為取締」。⁹⁵1933年臺北盲啞學校盲生部的7名教員中，3名畢業自東京盲學校師範科，1名畢業自東京盲學校普通科；⁹⁶學生則有臺人55位，內地人7位。1935年盲生部的7名教員，也是以東京盲學校畢業者為主，學生中臺灣人有53位，內地人11位。⁹⁷1919-1935年，臺北盲啞學校畢業的盲生，只有井上一和大村喜平前往日本盲學校師範科鍼按科就讀，兩人分別於1936年和1938年回到臺北盲啞學校任教。除此之外，臺灣與日本的教會往來也很密切。1936年日本耶穌基督聖團的盲人牧師喜久田虎雄來臺宣教，並拜訪臺北盲啞學校，了解臺灣盲人教育的實際情況。⁹⁸

四、臺灣與中國間的盲人流動

自古以來算命是中國盲人最好的出路，只要不是太懶、付不起學費、或多重障礙，幾乎都可以賴此維生。⁹⁹但傳教士基於信仰理由，並不贊成盲人從事算命

⁹¹ 畢業於日本東京聾啞學校師範科普通科。

⁹² 木村謹吾之子，曾在日本東京盲學校進修若干年。參見李佩欣，〈臺灣視障教育發展：以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為探討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26。

⁹³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1929年版），頁10、13。

⁹⁴ 〈全國盲聾啞教育大會概況〉，《臺灣教育會雜誌》338（1930年9月），頁135-136。

⁹⁵ 〈盲聾啞教育大會畢〉，《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8月5日，夕刊第4版。

⁹⁶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臺北：該校，1933），頁8、14。

⁹⁷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臺北：該校，1935），頁13、16-17。

⁹⁸ 〈盲人傳道者喜久田虎雄氏來臺〉，《臺灣青年報》83（1936年6月5日），第4版。

⁹⁹ Homer S. Wong (王湘元), "The Work Done by and for the Blind i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XIII: 1 (April 2, 1936): 12-17.

工作，因此提供給盲人的課程，除了點字外，主要以手工藝訓練為主。1891年甘為霖在臺南設立的「青盲學」，時間上僅次於1874年Hill Murray在北京、1888年David Hill在漢口設立的盲校；因此，臺灣的盲人教育便肩負了早期培育華南盲校教師的責任。1891年Miss Liliash Graham（禮荷蓮）欲在泉州設立一所盲校，便先向甘為霖求助。甘將盲人書籍和教具寄到泉州，並派林紅前去幫忙，¹⁰⁰林紅在中國時，經常會用點字寫信給甘為霖報告其狀況。¹⁰¹1892年1月，Miss Liliash Graham到臺南參觀盲校，並聆聽盲生郭主恩、蔡谿、陳春三人念點字書。同年9月22日，林紅回到臺南的青盲學繼續教書工作。¹⁰²

當時福建和臺灣一樣有很高比例的盲人，¹⁰³日本政府雖然透過興辦學校、醫院等方式經營與華南的關係，但並未在中國投入盲人教育工作或按摩訓練。¹⁰⁴不過，當時華南地區已有不少傳教士建立的盲人學校，例如1920年基督教會在中國設立的29所盲校，就有4所在福建。¹⁰⁵到了1930年代，全中國共有47所盲校，其中7所位於福建，而福建是美國衛理（Methodist）教派傳教重點地區。¹⁰⁶當時只有廣州明心瞽女學校提供按摩課程，¹⁰⁷其餘盲校的技藝訓練，仍以傳統手工藝編織為主。¹⁰⁸1930年代國民政府在中國取締算命，¹⁰⁹盲童父母鑒於星相

¹⁰⁰ 林紅的相關介紹，請參見注釋11。

¹⁰¹ 〈Chhiⁿ-mî-òh（青盲學）〉，《TÂI-OÂN-HŪ-SIÂN KÀU-HŌE-PŌ（臺南府城教會報）》83（1892年3月），頁17。

¹⁰² William Campbell, "Work for the Blind: Formosa," pp. 96-97.

¹⁰³ 甘為霖曾估計，十九世紀末臺灣及福建南部應該至少有2萬5,000位盲人。參見Willia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pei: SMC publishing, 1996), pp. 653-654。

¹⁰⁴ 由於盲人通學困難，設立盲校必須同時考量學生住宿問題，因此財政是設校的必要因素。參見室田有，〈本島人盲生教育に關して〉，《臺灣教育會雜誌》141（1914年1月），頁16-22。

¹⁰⁵ Milton T. Stauffer, "The Blind of China," in Milton T. Stauffer, secretary and editor, assisted by Tsinform C. Wong and M. Gardner Tewksbury,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pp. 365-367.

¹⁰⁶ 〈全國盲啞教育調查表〉，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13冊，頁17-23。

¹⁰⁷ 林女士，〈廣州明心瞽女學校誌略〉，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2冊，頁166-169。

¹⁰⁸ 傅步蘭，〈盲童學校〉，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1冊，頁130-134；〈全國盲啞教育調查表〉，頁17-23。

¹⁰⁹ 嚴昌洪，〈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風俗調查與改良活動述論〉，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下卷，頁1150-1166。

將成絕路，將盲童送往盲校者明顯增加。¹¹⁰ 但是中國盲校畢業生能找到工作的人數仍極少，例如廣州明心盲兒學校成立四十餘年，畢業生 120 人中有職業者僅 40 餘人，其中少數從事推拿工作。¹¹¹

這時期臺灣教會裡的盲人透過點字寫信，與福建教會保持聯繫。¹¹² 臺灣方面曾送盲字印刷機給中國的盲校製作教材，¹¹³ 中國教會也派遣盲生來臺唸書。1929 年來自福州的學生黃開華，就讀臺北盲啞學校盲生部鍼按科，¹¹⁴ 1932 年畢業後回到福州靈光盲學校¹¹⁵ 任教。隔年，臺北盲啞學校普通科四、五年級，及按摩分科二年級，也各有 1 名中國學生；¹¹⁶ 到了 1935 年，臺北盲啞學校鍼按科又有 1 名來自中國的新生。¹¹⁷ 這幾位盲生後來是否回到中國，還是留在臺灣工作，則不得而知。此外，臺南盲啞學校也有來自中國的學生，例如 1929 年該校技藝科畢業的朱春後來留在臺南，而 1931 年畢業的洪軍陣則回到福建工作。¹¹⁸

五、臺灣內部的盲人流動

許多盲啞學校的學生原來在鄉下幫忙農務，後來因為到盲校唸書才體驗到現代都市生活。例如 1915 年出生的楊月娥女士，12 歲時就讀臺南盲啞學校。她的父親是農夫，因此她每天上學前要「銼番薯簽給 3 隻豬、2 隻牛吃」。¹¹⁹ 就學時還要保正做保，證明她家務農付不起學費，才能免繳。畢業後母親陪她到鳳山租屋，出去按摩時也是由母親帶路。當時顧客以日本人為主，而日人多居住在都市，

¹¹⁰ 〈福督會〉，《教務雜誌》（1933 年 7 月），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12 冊，1983），頁 138-139。

¹¹¹ 傅步蘭，〈明心盲兒學校略述 廣州來稿〉，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11 冊（上），頁 109-110。

¹¹² William Campbell, "Work for the Blind: Formosa," pp. 96-97.

¹¹³ 傅步蘭，〈兩年來之重要發展〉，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11 冊（上），頁 113。

¹¹⁴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1929 年版），頁 10。

¹¹⁵ 由中華聖公會英籍澳洲人嶽愛美女士於 1898 年所創辦，即今福州市盲校前身。

¹¹⁶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1933 年版），頁 8。

¹¹⁷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1935 年版），頁 9。

¹¹⁸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1936 年版），頁 75-76。

¹¹⁹ 邱大昕訪問、杜庚錡記錄，〈楊月娥訪談紀錄〉（未刊稿），2006 年 4 月 6 日，於高雄。

因此從事按摩工作的盲人也會搬到都市來住。

從盲校在學學生的「出身」來看，多數學生是來自都市以外的地區。例如 1929 年臺北盲啞學校的在學臺灣盲生中，臺北州出身者共 36 人，其中僅 14 人來自臺北市，其餘則來自七星、淡水、宜蘭、文山、海山、新莊等郡；¹²⁰ 到了 1933 年，出身臺北州者增加至 50 人，其中 20 人來自臺北市；¹²¹ 1935 年，出身臺北州者共 49 人，其中 15 人來自臺北市。¹²² 剛開始盲生來源主要為盲校所在地附近的區域，但後來地理分布，則逐漸擴大。從《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歷屆畢業生的「本居地」來看，學生初期主要來自學校所在地，例如 1903-1915 年，臺南慈惠院盲人教育部的 20 名畢業生均來自臺南；¹²³ 但是到了 1916-1922 年，該校有 56 名畢業盲生，除了 34 人來自臺南（60%）外，另有臺北 11 人、高雄 6 人、臺中 5 人；1923-1936 年，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的畢業盲生共 116 人，除了 65 人來自臺南（56%）外，還有臺北 9 人、高雄 16 人、臺中 12 人、新竹 5 人、臺東 1 人。

盲生畢業後多留在都市工作，只有少數回到原居地。1903-1936 年臺南盲校畢業生共 192 人，扣除來自日本和中國的 7 人、1936 年已過世的 29 人，及 1 名現住所不明者外，臺灣盲人畢業生尚健在者有 155 人。其中 98 人（63%）居住在都市裡，包括臺南市 34 人、高雄市 19 人、臺北市 15 人、嘉義市 14 人、屏東市 5 人、臺中市 4 人、新竹市 4 人、彰化市 2 人、基隆市 1 人。因《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並未載明學生畢業後的住處，無法知道其畢業後的流向。不過綜合上述討論大致可以看出，臺灣盲人因為求學的緣故離開家鄉到都市生活，畢業後多選擇留在都市工作。因此，到了 1945 年日本結束統治時，中國遊客到臺灣時已見到如下景象：

臺灣的黃昏……會有一聲聲短笛，輕清的，幽怨的，傳入你的耳際。這聲音此起彼伏，決不是詩人的吟嘯，也不是流浪者的吹奏。他們是一羣職業

¹²⁰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1929 年版），頁 7。

¹²¹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1933 年版），頁 9。

¹²²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1935 年版），頁 10。

¹²³ 日治時期的臺南州，轄域涵蓋今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

者，他們的職業是按摩。正和江南鄉鎮上躑躅街頭的那些算命先生一樣，臺灣的按摩者，都是盲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憑着一根杖，或是由一個小孩牽引着，像幽魂般徘徊在街頭。¹²⁴

六、結論

盲人其實經常在流動，不論是傳統的走唱、算命，還是後來的吹笛按摩，他們都經常在大街小巷穿梭，或一個接著一個城鎮地遊走。這些移動，也許是基於個人經驗的判斷，也可能是隨機探索性的「盲流」，然而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盲人移動，則是國家政策與交通建設（如 1908 年完成的縱貫鐵路）所促成有方向性的移動。如本文一開始提到，臺灣盲人流動最早是教會設立醫院和學校所造成，由城市周圍往中心就醫和就學的移動；日治時期則主要由殖民地政策與教育制度所促成，使臺灣盲人從鄉村到城市、再到日本，然後返臺工作，或從日本、中國來臺灣工作、就學。透過教會人際網絡，在臺灣、日本與中國三地之間，形成一種以臺灣為核心的放射狀結構。

盲人按摩在臺灣社會福利和特殊教育是個經常被研究的題目，但是臺灣盲人及身心障礙的歷史，卻是迄今尚未開發的領域，因此存在許多以訛傳訛的誤解。例如過去多以為臺灣盲人以按摩維生是日本殖民時期對盲人保障的結果，然而這樣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日本政府不論在內地還是臺灣，均未曾在法令上限定只有盲人才能從事按摩業，日治時期臺灣盲人從事按摩業者逐漸增加，主要是教育制度和法規政策間接造成的結果。1924 年公布的「按摩術營業取締規則」，規定參加按摩術考試甲種必須修畢四年以上的按摩術，乙種考試則為兩年以上。不過當時得以修習按摩術的機構只有盲啞學校，明眼人若要學習就必須遠赴日本，因而限縮臺灣非盲人取得資格的機會。這些政策限制和對臺灣傳統掠龍的取締，也可能單純是為了保障日本按摩和針灸師來臺的工作機會，而不見得是為臺灣盲人設想。日本殖民政府很晚才願意接手臺灣的盲人教育，可見當局對臺灣的特殊教育並不重視，反而是西洋傳教士和具有基督教背景の木村謹吾，才是臺灣盲人教

¹²⁴ 乃藩，〈台灣的按摩〉，《申報》，1946 年 5 月 23 日，第 8 版。

育的主要推動者。

1942年日治末期，全臺從事按摩工作者共有502人，¹²⁵ 這個數目和臺灣盲人總勞動人口相比，非常少數，且其中還可能包括許多非盲人按摩師。不過，就收入水準而言，按摩可能已經成為臺灣盲人主要的謀生途徑。日治時期臺灣按摩市場主要顧客群為來臺的日本人；日本戰敗之後，日人大量離臺，為何臺灣盲人仍能繼續以按摩維生，則是值得未來持續探究的課題。根據1955年臺灣盲人福利協進會的統計，當時全臺1萬4,482名盲人中，僅1,700多人能夠自食其力，其中以按摩者716人（42.1%）、卜命者455人（26.8%）最多，其餘從事農業者115人（6.8%）、經商52人（3.1%）、道士39人（2.3%）、賣唱32人（1.9%）、電療31人（1.8%）、教員6人（0.4%）、其他195人（11.5%）。¹²⁶ 到了1957年，臺灣省政府警務處頒布「臺灣省各縣市按摩業管理規則」，其中第二條規定「凡從事按摩業者，需雙目失明」，¹²⁷ 後此按摩正式成為保留給臺灣盲人的職業，而這項政策多少與日治時期出現的臺灣盲人組織有關。臺灣第一個由盲人發起的團體是廖旺於1922年創辦的「鍼按組合」，他擔任組合長29年之久。廖旺在早期盲人團體中非常活躍，1936年8月29日，來自高雄、臺南、嘉義、基隆、彰化等地的盲人，在臺中市公會堂成立「臺灣盲人會」，也是推舉他為首任會長。國民政府來臺後，第一個盲人組織是1953年成立的「臺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廖旺也曾擔任該協會理事。¹²⁸ 盲人組織在國民政府時期推動的殘障福利法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不過這是後話，留待另文探討。

¹²⁵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四十六統計書》（臺北：該課，1944），頁102。

¹²⁶ 〈雖殘不廢自力更生盲人福利大會 昨在中市召開全省訊者萬四千人〉，《徵信新聞》，1955年12月16日，第3版。

¹²⁷ 〈臺灣省各縣市按摩業管理規則〉，《臺灣省政府公報》22（1957年10月23日），頁343。

¹²⁸ 廖明惠，〈眼失明心光明：盲人教會創辦者廖旺〉，頁10。

引用書目

《淡新檔案》，編號：33311.12、17206.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TÂI-LÂM-HÚ-SIÂⁿ KÀU-HŌE-PÒ》(臺南府城教會報)

《TÂI-OÂN-HÚ-SIÂⁿ KÀU-HŌE-PÒ》(臺灣府城教會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北廳廳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協會會報》

《臺灣青年報》

《臺灣省政府公報》

《臺灣教育會雜誌》

《臺灣教會公報》

《臺灣總督府府報》

《微信新聞》

The Monthly Messenger

The Presbyterian Messenger

劉建仁，〈青瞑 (ts'ê-me' / ts'i-mi')：眼瞎、瞎眼、瞎子〉，《台灣話的語源與理據》，下載日期：2014 年 10 月 22 日，網址：<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

邱大昕訪問、杜庚錡記錄，〈楊月娥訪談紀錄〉(未刊稿)，2006 年 4 月 6 日，於高雄。

蔡龍雄，〈九十年來臺北啟明史〉(未刊稿)。

乃 藩

1946 〈台灣的按摩〉，《申報》，1946 年 5 月 23 日，第 8 版。

中山太郎

1934 《日本盲人史》。東京：昭和書房。

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

1983 《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1、2、11 (上)、12、13 冊。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

木村謹吾

2012 〈臺北訓盲院設立趣意書〉(1915 年)，收於臺北啟明學校編，《北明叢書 38 輯》，頁 11-12。臺北：臺北啟明學校。

片岡巖

1921 《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肖永芝

1999 〈日本古代針灸醫學源流概論〉，《中國針灸》5: 309-312。

李尚仁

- 2004 〈醫學、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專題導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4: 1-16。
2009 〈展示、說服與謠言：十九世紀傳教醫療在中國〉，《醫療、科技與社會》8: 9-74。

李佩欣

- 2014 〈臺灣視障教育發展：以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為探討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編）

- 1944 《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臺北：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邱大昕

- 2009 〈被忽略的歷史事實：從視障者工作演變看大法官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2): 55-86。
2011 〈為什麼馬殺雞？：視障按摩歷史的行動網絡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3: 5-36。
2012 〈臺灣早期視障教育之歷史社會學研究（1891-1973年）〉，《教育與社會研究》24: 1-39。
2013 〈誰是盲人：臺灣現代盲人的鑑定、分類與構生〉，《科技、醫療與社會》16: 11-47。
2015 〈臺灣早期身心障礙社會工作初探：以甘為霖的盲人工作為例〉，《當代社會工作學刊》（即將出版）。

東京盲學校（編）

- 1935 《東京盲學校六十年史》。東京：東京盲學校。

室田有

- 1914 〈本島人盲生教育に關して〉，《臺灣教育會雜誌》141: 16-22。

容世明

- 2012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生 1903 年的日本修學旅行〉，《臺灣醫界》55(11): 43-47。

張蘭馨

- 2005 〈張謇和他創辦的狼山盲啞學校〉，《教育史研究》1: 35-36。

許雪姬

- 2002 〈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收於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論文集》，頁 396-417。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許炳榛

- 2006 《乙巳考察日本礦務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

陳燕禎

- 2005 〈臺灣社會福利發展：日治時代社會福利機構的歷史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9: 226-244。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編）

- 1929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臺北：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
1933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臺北：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
1935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一覽》。臺北：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編）

- 1930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臺南：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
1936 《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一覽》。臺南：臺南州立臺南盲啞學校。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200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

1944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六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

1905 《臺灣總督府第九統計書》。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

1925 《臺灣衛生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廖明惠

2009 〈眼失明心光明：盲人教會創辦者廖旺〉，《臺灣教會公報》3002: 10。

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

2012 《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校園生活、補習文化、體罰、校園欺凌及抗拒殖民形式》。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鄭志敏（輯錄）

2004 《日治時期《臺灣民報》醫藥衛生史料輯錄》。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劉寧顏（總纂），李雄揮、程大學、陳清添（編纂）

1993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6 文教志：教育行政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盧啟明

2012 〈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信徒之身分認同（1937-1941）〉，《臺灣學研究》14: 147-170。

嚴昌洪

2008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風俗調查與改良活動述論〉，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下卷，頁1150-116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Campbell, William 甘為霖

1996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pei: SMC publishing.

1910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Hastings: F. J. Parsons.

Kobayashi, Akiko, 小林章子 Miwa Uefuji and Washiro Yasumo 安雲和四郎

2010 “History and Progress of Japanese Acupuncture.”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7(3): 359-365.

Stauffer, Milton T. 司德敷

1922 “The Blind of China.” In Milton T. Stauffer, secretary and editor, assisted by Tsinform C. Wong and M. Gardner Tewksbury,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pp. 365-367.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Wong, Homer S. 王湘元

1936 “The Work Done by and for the Blind i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XIII(1): 12-17.

Movement and Relocation of the Blind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sing Chiu

ABSTRACT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are often considered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restricted in mobility and consequently limited in range of activities. In fac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blind from Taiwan shuttled across the Strait under the auspices of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blind from Taiwan travelled to study in Japan, whil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came to study in Taiwan, again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and assistance of missionaries. The then colonial employment policy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mobility of the blind.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many people with normal vision began working as masseurs and acupuncturists in Japan, jeopardiz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local blind. On the contrary, in Taiwan only the blind could learn massage and acupuncture in schools for the blind. With the banning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massage in colonial Taiwan, many Japanese blind relocated to Taiwan for work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Blind, Movement, Massage, Acupuncture, Christianity